

“止于至善”与至善不止

——兼论毛泽东“从思想上入党”的理论价值和文化价值

米 华,滕茜茜

(湖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 要]毛泽东“从思想上入党”所包含的共产党人必须自觉改造世界观、党内要经常性地开展无产阶级思想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党员修养要达到“至善不止”的境界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有理论创新价值。毛泽东运用儒家修养论思想资源,进行党的思想建设所表现出的文化自信和自觉以及他对传统文化现代性转换的探索,具有光大传统文化生命力的文化价值。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上入党;建党思想

[中图分类号]A84;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2)05-0121-06

Aiming at Absolute Perfection and Pursuing Absolute Perfection Ceaselessly

——On Theoretical Value and Cultural Value of Mao Zedong's Thought of Joining the Party Ideologically

MI Hua, TENG Qianqian

(School of Marxism,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Xiangtan, Hunan, 41120, China)

Abstract: The thought of Mao Zedong on joining the Party ideologically includes that Party members must transform the world outlook self-consciously, and fight with proletarian thought to non-proletarian one in Party regularly, as well as pursue absolute perfection ceaselessly in members' cultivation, which has theoretically innovative value to the Marxist party theories.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confidence as well as traditional culture to modern culture transformation that displayed in Mao Zedong's ideology with the resource of Confucian moral cultivation, had cultural value in developing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Mao Zedong; join the Party ideologically; Party establishing ideology

“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是儒家开展自我修持依次递进的三个层次,其中“止于至善”为最高境界。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为建设一个坚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提出全党同志必须“从思想上入党”的主张,并要求达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境界,即“至善不止”的境界,实现了对儒家“止于至善”修身传统的超越。

一 毛泽东“从思想上入党”的理论价值

毛泽东“从思想上入党”的理论价值主要表现在它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建设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从早期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只有建设一个成熟而坚强的无产

收稿日期: 2012-07-20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毛泽东党建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07JD56)”

作者简介: 米 华(1966-),男,湖南溆浦人,湖南科技大学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及民族文化心理研究;滕茜茜(1989-),女,湖南溆浦人,湖南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

阶级政党,使之成为工人阶级的领导核心,才能使分散的无产者联合起来,最后战胜资产阶级。由此出发阐述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必然性,并认识到思想理论建设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基石。那么,如何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首先,马克思恩格斯着力用科学理论武装无产阶级政党,统一全党思想。他们认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观点作为理论的基础”^[1],并要求用这个科学的理论指导现实的革命运动。为此,他们一方面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灌输自己的理论主张,尽可能地使理论为群众所掌握。另一方面为捍卫党的理论的纯洁性,又与各种敌对思想和错误思潮开展不妥协、不间断的斗争。主要表现在:一是对资产阶级“批评家”的进攻从不掉以轻心,不拿原则做交易。二是对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修正主义等错误思潮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三是对党内各种错误思想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加以肃清,如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等。其次,通过党的纲领建设、宣传来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马克思恩格斯先后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过两个纲领,一个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制定的《共产党宣言》;另一个是为“第一国际”制定的《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这两个纲领使无产阶级政党有“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以此来号召和团结人民群众,达到党内外同志和群众思想上有遵循,行动中有方向,斗争中有武器的目标,克服狭隘的只追求经济利益的工联主义错误倾向。再次,通过党的组织建设来确保科学理论和纲领的贯彻落实,如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确立等。

由于当时的西欧是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西欧各国的工人阶级队伍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代表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高水平,具有较高的无产阶级革命觉悟和思想素养,所以,党员个人的思想建设问题并不十分突出。加之日益急迫的革命运动、繁重的理论建设任务以及欧洲缺乏个体修养的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较少思考党员个人的思想道德建设问题。虽然马恩在工人阶级政党建设过程中,也因思想理论问题把一些不坚定分子或阶级异己分子清除出党,但并没有解决全体党员从思想上入党的问题。所以,在他们相继去世之后,由于缺乏旗手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领导,西欧共产主义运动逐渐陷于低谷,使马克思

主义在西欧至今还没有取得令人瞩目的实践成果,这不能不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大遗憾。

列宁在创建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加强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理论建设的优秀传统,十分重视科学理论对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指导意义,提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2],注重对俄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注意同各种敌对思想和错误思潮进行斗争,用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方法维护全党的思想统一。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共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面对的形势和肩负的任务也大不一样。列宁认识到当时最大危险来自党内的骄傲自大、独断专权、官僚主义、个人崇拜和贪污腐化等不良倾向,并深刻分析了它们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和文化根源。他认为小农经济条件下形成的落后的民族文化心理,如因循守旧、懒散怠惰、沉湎于幻想的人生态度等是党的肌体蜕化变质的重要原因,开始注重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特别重视提高党员个体的素质。为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首先,列宁注重用灌输的方法提高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在他看来,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刚刚开始,社会主义思想在各方面还不成熟,必须加强灌输,否则就会被资产阶级思想占领。所以他说:“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3]其次,他规定了更为严格的入党条件。把那些混进党内的徒有其名的追求私利的不符合入党条件的人,坚决清除出党。再次,列宁通过组织群众的方式对党员干部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进行监督。在他看来,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只有当它不脱离群众,才能完成其历史使命。因此,他要求组织群众对党员干部进行监督,以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最后,以党内民主建设和制度建设促思想作风建设。无论革命时期还是执政时期,列宁都身体力行地坚持党内民主,通过各种方式保证党员的民主权利,并建立党的检查委员会来确保思想作风建设的落实到位。由此可以看出,在提高党员的思想理论素养方面,列宁实现了对马恩关于党的思想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

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农民和其他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参加党,不可避免地要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带进党内,经常在政治上表现为“左”右摇摆,在思想意识上表现为极端的个人主义,在组织上表现为严重的宗派主义,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后果。面对这种状况,若不真正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影响,树立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地位,党就不可能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就不能完成历史赋予党的使命。为解决这一党内本质矛盾,毛泽东提出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光辉思想。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认识到,党是由党员组成的,党员的质量决定着党的战斗力,因此,要落实“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理论。对党员个人来说,最集中的要求,就是必须从思想上入党的。早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就十分注重党的思想建设,他说:“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人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4]77}为此,他简要规定了入党的基本条件: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其中包含了从思想上入党的内容,并要求每一个党员自觉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加强党性修养,严格规范自己的言行。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又不断充实和完善共产党员的条件和党性修养的标准。但明确提出从思想上入党这个重要的建党思想是1942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说:“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5]875}至此以后,从思想上入党成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原则,引导着广大党员认真解决自己从思想上入党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正是遵循毛泽东关于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的要求,从而使我们的党始终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成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不断涌现雷锋、焦裕禄式的先进典型,永葆党的生机与活力。

毛泽东“从思想上入党”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

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建设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其思想内容十分丰富,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要求共产党员必须自觉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无产阶级世界观对于任何一个党员个人来讲,都是不可能自发产生的,需要对已经形成的不正确的世界观加以改造,从而要求党员个人要有不断改造自己世界观的自觉,加强党性锻炼和修养,始终保证有科学的世界观武装自己的头脑。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有许多论述:“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4]296}为消除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影响,毛泽东还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等方面,论述了两种世界观的根本分歧,艰辛探索了如何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途径。同时,他还认识到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彻底改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因此,需要培养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功夫。二是要在党内经常性地开展无产阶级思想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共产党是从现实社会产生的,它与整个社会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社会上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他说:“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4]306}早在1929年他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就指出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表现、来源及纠正方法,后来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又进一步系统化。1945年他又明确指出党内矛盾是“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其中有小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甚至地主阶级的思想,而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之间的矛盾,即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5]1108},在后来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更加严肃地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至于如何在党内开展无产阶级思想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毛泽东也积累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如党内整风的形式,他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就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宗旨和“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彻底纠正了当时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等等。三是提出共产党员修养要达到“至善不止”的境界。最能体现他对党员个人修养目标规定是《纪念白求恩》。他要求全党同志要做到“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

人民的极端的热忱”,要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6]660}这里的“高尚”“纯粹”“有道德”“脱离了低级趣味”“有益于人民”是没有止境的。这些内容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较少论及的,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杰出贡献。

二 毛泽东“从思想上入党”的文化价值

毛泽东“从思想上入党”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实际相结合的结果,它不仅具有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建设的理论创新价值,而且还具有光大中国传统文化生命力的文化价值。

首先,它表明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文化具有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鸦片战争以降,西方文化携坚船利炮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亘古未有的冲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成为当时的中国文化人必须面对的紧迫问题。在一系列尝试失败后,以新文化运动爆发为标志,中国社会产生了两种截然对立、影响颇大的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主张。以陈独秀、鲁迅、吴虞、易白沙、胡适等为代表的新派,针对袁世凯的尊孔读经逆流和复辟帝制的黑暗统治,响亮地喊出“打到孔家店”的口号,扫荡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意识形态、价值体系、礼教传统,表现出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的态度。为迅速完成社会转型的历史使命他们甚至提倡“全盘西化”,又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缺乏自信的历史虚无主义。面对新派的猛烈进攻,文化保守主义者在仓促应战之后沉寂下来,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思考,于是有了现代新儒学。现代新儒学的兴起,一方面出于对“全盘西化”文化主张的理性回应,另一方面则表现出对当时西方文化无可奈何的恐惧、焦虑和抗拒的文化心理,背后暗合着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情绪。表面看是他们在挽救民族文化危机,其实并没有自觉弘扬民族文化,而是文化自觉丧失的明证。甚至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他们所进行的文化建设仍纠结于传统的“道统说”,把“诚”作为文化建设的核心,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八德”,以“礼、义、廉、耻”为“四维”,用“八德”“四维”为经纬织出封建色彩浓郁的国家

精神网络,缺乏政府应有的民族文化自觉。

而同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过程中,在汲取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建设养分的同时,十分注重与中国文化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中国化,最早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自信与自觉。

从文化自信的角度看,虽然我们站在社会发展的角度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结晶,但我们从中西文化差异性视角理解,马克思主义主要是西方优秀文化成果的结晶,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对中国古典文化应该说知之不多,尤其对儒家的教化传统缺乏深入了解,如儒家的重德治,重视“修身”“正己”,提倡“吾日三省吾身”等,成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思想建设理论所欠缺的内容。在此前提下,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积淀、中西文化问题有思考的毛泽东认识到中国文化中的珍品同样可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他所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珍贵的遗产。”^{[6]533-534}对此毛泽东还有许多精辟的论述。由此得出结论,即便是具有很高理论水平的马克思主义,也必须吸取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这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文化的高度自信。

从文化自觉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人文情怀,崇尚务实求真、经世致用的实践理性,追求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倡导以礼节情、自觉修身,尤其是儒家十分重视人生修养和主观世界的改造。而西方文化随着工业化程度的加深日益显露出自身的弊病,功利主义、实利化、过度商品化等极度膨胀,导致拜金主义风行、价值观扭曲、道德沦丧、自然环境恶化等严重的社会后果。中国传统文化正好能够弥补西方文化这方面的缺陷。当时正在进行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建设的毛泽东,恰逢其时地运用儒家重视道德教化和重视主观世界改造的中国文化传统,创造性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党员的党性锻炼和党性修养,提高党员的思想道德素质,解决全体党员“从思想上入党”的问题。这种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果敢和勇气,正

好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文化自觉。正是有这样一种文化自觉,才使毛泽东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党的思想建设理论,并通过全党同志的努力实践,使一个主要成分是非无产阶级、且长期在农村活动的革命党,依然能保持无产阶级先进性,最终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其次,这是近代中国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性转换的初步尝试。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植根于农业生产方式,具有天人感应观念下的迷信思维、遵从上下尊卑的宗法等级秩序以及以血缘家庭为纽带的人际关系模式等弊端,它服从并服务于封建专制统治。近代中国从传统到现代、农业文明到工业化的转变过程中,传统文化中陈腐的道德价值观、保守的行为方式、褊狭的民族文化心理等显现出严重的阻碍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消极因素是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主要羁绊,迫切需要我们站在现代化和文化发展的高度上促其进行现代性转换。从儒家修养论本身看,虽有追求道德化、诗意化的人生境界和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精神气象,但也有严重缺陷。儒家自我修持实现的路径是个体用反省内求的方式来抑制其不合“礼”的邪念恶行,最后演化成“存天理、灭人欲”的反人性禁条,导致过分强调个人必须服从整体的稳定,抹杀人的个性和个人自由;过分强调精神、道德的作用,忽视社会物质利益的力量;过分强调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忽略个人利益等后果。于是,道德就顺理成章地取代了物质力量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是非判断的主要标准,形成了泛道德式的社会运行机制。结果并没有实现儒家先贤们期盼的人皆君子的修养目标,反而导致私德膨胀而公德缺失,造成传统中国人虚伪、麻木、冷漠的阴暗心理。这些缺陷在传统社会并没有无限放大,某些时期甚至还能表现出田园诗般的温情脉脉,保持社会的良性运行。近代中国社会逐步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儒家修养论的时代局限性也逐步显现,迫切需要进行现代性转换。

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时,革命中心由城市转向农村,革命队伍中的农民成分剧增。为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必须着重进行党的思想建设。在进行党的思想建设过程中,毛泽东运用儒家修养论思想资源,提出要解决“从思想上入党”的问题,形成了相

应的理论观点,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探索。应该说,这种努力是中国近代对中国传统文化实现现代性转换的最早尝试。毛泽东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对儒家修养传统实现了现代性转换:

第一,实现了对儒家修养论政治功能的现代性转换。儒家修身传统是从家族内部关系入手,“入则孝,出则悌”是修身最基本的出发点,然后扩展至人我关系,要求做到“忠”和“恕”。这样就需要每一个修养主体必须具备“恭”“宽”“信”“敏”“惠”五种基本品德,最后成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人。这种修身从表面看与政治无关,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中,“国”是放大的“家”,“家”是缩小了的“国”,于是,移孝作忠便顺理成章,收到了国家家族化、家族政治化的效果,儒家修身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政治功能就显现出来了。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个体修养是具有政治性的,但放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考察,儒家修身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政治功能必须要进行现代性转换。毛泽东“从思想上入党”的论断,就是要求党员干部自觉地进行党性修养和锻炼,具有成为人民公仆的意识,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早在1938年他就指出:“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6]522}1945年他又说:“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7]这样他通过“公仆”这个桥梁和纽带,成功实现了儒家修养论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政治功能的现代性转换,即转换成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功能。

第二,实现了对儒家修养境界的现代性转换。儒家修养论对个人修养境界的追求表现为依次递进的三个层次,即列为儒家经典“四书”之首的《大学》开篇提出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明明德”为最低层次,即要求每一个修养主体必须深刻领会并把握仁义礼智等纲常伦理之道。第二个层次是“亲民”,即在自明其明德的基础上,推以及人,帮助他人也能去其旧染之污,成为“明明德”之新民。儒家修养追求的最高境界是“止于至善”。儒家“至善”是指在浑然不觉中执着不放地遵循纲常名教的境界,到达这种境界就可以不需要再修身养性了。由此可见,儒家修养论是一个有终点的主体修养体系。毛泽东“从思想上入党”的主张,是通过

每一个党员不断地进行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最终成为一个“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的人。也就是他所要求的成为五种品德的人,而其中的“高尚”“纯粹”“有道德”“脱离了低级趣味”,最终又落脚于“有益于人民”,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是共产党人修养的“至善”。如此,毛泽东便把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与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属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正如雷锋在他的日记中所理解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所以,共产党人的“至善”是不可停止也是不能停止的,即“至善而不止”。因此,毛泽东把一个有终点的修养论转换成一个没有终点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建设理论,实现了儒家修身养性传统境界的现代性转换。

第三,实现了儒家修身养性方法的现代性转换。儒家为达到“止于至善”的终极目标,需先从“明明德”入手,然后拓展至“亲民”。如何才能使每一个修养主体能够“明明德”再“亲民”,儒家先贤们又导出“八目”,即: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要“明明德”必须通过修身养性这个中介,修身则需意诚,意诚就需心正,心正必须致知,致知则需格物。儒家所指称的格物致知就是要接触事物,获得道德认知。认知的重心在道德而非自然,认知的方法重在内心的体悟而非社会实践,遵循的是一条唯心主义认识路线,正如王阳明拿着竹子来格物致知,最后也只“格”出了他的心学。所以,儒家脱离社会实践的修身方法是需要进行现代性转换的。毛泽东在解决“从思想上入党”问题时,曾反复强调要用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方法来进行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他说:“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没有党性,或叫着党性不完全。”^{[5]800}因此,毛泽东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修养方法,成功实现了对儒家唯心主义修养方法的现代性转换。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在实现儒家修养论的现代性转换过程中也有不足。在他看来,通过修养就可以使人有理想、尚气节、重道德、讲操守、求奋斗,而轻物欲、绝私利、弃委靡、鄙庸俗,从而造就一代又一代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志存高远、心怀天下的无产阶级新人。然而,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的修养结果也是大相径庭的,各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平必然参差不齐,加之道德本身又缺乏强制性,因此,不是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成为毛泽东所期待的那种新人,所以仅仅依靠修养的方法来培养新人,有时会显得空疏乏力。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9-40.
- [2] 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
- [3] 列宁.列宁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8.
- [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5]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7]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43.

责任编辑:骆晓会